

# 学术研究须植根于事实

□ 钱乘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眼中的历史关键时刻》的专论文章，文章的论点是：历史是由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时刻造成的，这些就是人类历史上“星光灿烂的时刻”。为提供论证，文章向读者推荐斯蒂芬·茨威格在1927年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并引用其中茨威格的看法，说历史是在“千年的链条中添加一环又一环”，偶尔会有“一些关键的时刻出现在世界上”，是这些时刻“决定了数十乃至数百年的时间……瞬间就决定一切：‘做’或者‘不做’，‘做早了’或者‘做晚了’，正是这些瞬间造成不可逆转之势并延续一代又一代”。

无疑，这是一种“历史偶发论”。这种历史观在18、19世纪曾经很流行，当时的西方人相信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组成的，即所谓“人类群星闪耀时”。不过，这样一种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很少有人相信了。尼尔·弗格森——当今欧美最走红的历史学家，如果当真如此看待历史，那是一点让人惊讶的——那就相当于把二战乃至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变化全都放在脑后，相当于回到了托马斯·卡莱尔的时代。

不过，更让人迷惑的还在下面，弗格森继续写道：“决定历史的时刻其魅力之所在，部分取自于茨威格所选的例子，其中三个是政治上著名的事件：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1917年列宁返回俄国。其他例子没有那么显著，但仍仍在地理发现和经济历史上十分重要：巴尔博亚第一次见到太平洋，约翰·苏特尔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斯科特和阿蒙森为抵达南极而殊死竞赛。”

茨威格的书中写了12个故事，其中3个确实是“政治上著名的

事件”，其他就比较一般，比如歌德和他的女朋友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临刑时突然被赦免，威尔逊总统理想主义破灭，以及上文引述的几个例子，等等。茨威格是文学家，他写的是小说，写小说不等于写历史；尽管茨威格声称他尽可能真实地写作，但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毕竟不同。然而历史学家弗格森仍然把茨威格的故事拿出来为自己背书，那就有一点走样了。

关于那3个“政治上著名的事件”，他是这样写的：“按茨威格的看法，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奥斯曼那位年轻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无情谋划的结果；但该城防卫之崩溃，则因为一座不起眼的小门凯尔科门，在无意中没有关上而造成。拿破仑最终失败，是格鲁黎元帅迟疑不决的结果，他死守成命，紧跟在普鲁士第三军团后面，而不是在炮声隆隆、战事告急的关键时刻奔向战场。”格鲁黎思考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的命运。拿破仑的命运以及世界的命运。”列宁回俄国，是一次更严重的误判的结果；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只会摧毁沙俄帝国，然而在1918年11月德国也被工兵委员会控制了……”

在缺少一般历史知识的普通读者眼里，这些叙述显然很有戏剧性，人们读后会立刻联想：“假如当时不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会……”我想这就是弗格森的动机——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不过在专业历史学家眼里，这种小说中的情节即便不完全虚构，也不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学家都知道：1453年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陷落时，拜占庭帝国领土只剩下这座孤城了，城市被围得水泄不通，即使凯尔科门锁紧不开，君士坦丁堡仍然是要陷落的；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是因为法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摧毁了，拿破仑投入战场

的最后军队，连未成年的十几岁娃娃兵都上阵了；德国人帮助列宁回国，固然有内部瓦解沙俄帝国的考虑，但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内外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列宁回到俄国也没有用。这些都是普通的历史知识，作为历史学家的弗格森——出版过《西方的衰落》《文明》《帝国》等一大批鸿篇巨著的当红历史学家，应该对此深信熟知。然而，弗格森却选择20世纪初一位奥地利文学家的故事集为他的文章做注脚，令人惊诧不已。

不过这反映着当今学术界一个通病，也是世界性的通病。《文汇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德莱茨纳的新著《思想产业》，其中关于弗格森写道：凭借《西方的衰落》走红的历史学家弗格森是德莱茨纳所谓思想产业链中的典型案例。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弗格森直率地表示自己从牛津学者转型写这类著作，“都是为了钱”。一边是学界宁回俄国，是一次更严重的误判的结果；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只会摧毁沙俄帝国，然而在1918年11月德国也被工兵委员会控制了……”

“孤立论”因有恃美国的全球新战略而被抛弃，与之互为表里的“边疆冲突论”则因不合于美国战后国内文化主流而同样遭到批判。战胜国的荣耀及战后的欣欣向荣自然呼唤美国历史解释的再出发。以“冲突论”分析美国史见长的进步主义史学日渐没落，更受欢迎的是凸显美国历史连续性和社会稳定性的“和谐论”史学。恰逢此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以全新的历史解释表达了繁荣时代所需的自信。他在著作中写道：“特纳意识到了美国的成就，但没有恰如其分地在历史作品中反映这种成就，他把西部的发展描绘成了美国扩张主义的狂傲记录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哲学。此等论断尽是空洞的爱国主义。”

## 变革年代的解构与重构

霍夫斯塔特对特纳的批判很快也成为历史。就在他精心描绘心中的和谐社会图景时，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社会变革。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民权运动与反战抗议此起彼伏，性格怪异的各色“主义”冲击着美国人的传统观念与基石。在学术领域，新史学运动风行欧美，“拓展史学新园地”和“自下而上看历史”等新观念、新方法而美国传统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发起挑战。象牙塔内外的社会与文化变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批判“边疆假说”的新合力，推动了“新西部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成。

1983年，名为《历史学家与美国西部》的论文集出版，主编米切尔·马隆教授认为，“西部史正处于转折点上，现在迫切需要总结

的钱。这就是德莱茨纳所谓的“思想产业链”——一个金钱世界流行的现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些“虚假的思想产品”？人们往往判断不了学术的优劣真伪，“品牌效应”和“名人效应”（尤其是“洋品牌”和“洋名人”）时常支配着人们的判断力。在中国，“追风”和“权威者云”也是学术的常见弊端。最近几十年，盲目崇拜国外的所谓学术权威和理论范式尤为值得注意。进而，也就引出了本篇文章的主题：检验学术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检验学术、判断学术、衡量学术、评价学术？我的回答是：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学术当然有诸多标准，比如规范与否、文字好坏、逻辑如何、论证怎样，等等；但这些只属于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不符合第一层次的基本标准。现在学术界有一个通病，就是脱离事实，凭空想象，从推理到推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殊不知，逻辑的正确并不意味着事实的正确，一旦事实不正确，一切都不正确。如此通病不仅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弗格森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例证；同样现象不仅在历史学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有，甚至在自然科学也会有。一段时间以来，种种学说盛行于中国，而中国学术界却很少用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所谓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就是将各种学说放在事实中加以检验，经得起检验的才是正确的；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就应该抛弃。

对种种流行理论加以事实的检验就可以知道：有一些可能符合西方的事实，比如“后工业社会”，因为西方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这种理论对中国不合适，因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有一些尚未得到事实的检验或者与

现实情况不符，在现阶段仍只是理论假设，比如“欧盟超越民族国家”论，它与近几年欧盟的走向并不相符。有一些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在现实中行不通，甚至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比如“多元文化主义”，虽说其理念很好，付诸实践就行不通。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欺人之谈，为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冷战思维模式，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民族国家过理论”，以及近几年突然盛行的“帝国研究”热。

以事实作为检验学术的标准，我们的学术就能做到不盲从、不跟风；中国学术界才能做出自己的研究，做出“原创作品”。中国学术界应达成共识：学术研究来源于事实、植根于事实、服务于事实，最终又接受事实的检验。判断一项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事实，而在于它依据了多少事实；衡量一项学术成果的水平，不在于它引用了多少文章，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事实。真正伟大的学术成果都是在事实的启示下深刻认识了事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过程中出现的。以西方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解决重商主义造成的经济问题；凯恩斯批评亚当·斯密，是因为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衡；而当凯恩斯主义面对庞大的公共开支和停滞的经济指标一筹莫展时，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些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们在各自的时代符合那个时代的事实，并能够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一旦出现新的事实需要新的解释时，新的理论就取而代之。离开事实，既无所谓理论、更无所谓创新。正因如此，中国学术应该将各种理论放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 特纳史学批评史百年回顾

□ 王邵岳

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北美西部土地拓殖的内生性因素重新解释了美国国家历史道路的形成。此后百余年间，特纳的学说持续发酵，在变动的历史语境和史学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被赋予各种新意。经由批评和再认识而层累叠加的“边疆阐释”，构成了美国现代史学中一道跌宕绵延的学术风景，映现出20世纪美国时代潮流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价值观与历史编纂学的嬗变。

## 危机中的反思与批判

特纳在提出“边疆假说”后声名鹊起，针对性的批评也在其学术声誉日隆之际悄然而至。20世纪20年代，特纳文集《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甫一面世，笔伐之声便见诸报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当属被冠以“进步主义史学旗手”之名的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肯定“边疆假说”中的经济因素，但同时认为特纳过于强调“边疆”和“地域”，忽视了对于美国历史发展更具重要意义的“阶级”。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萧条与社会危机，改变了进步主义时代关于美国历史特征成因的经典论断，启发美国历史学家从坚实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基础中寻找比“边疆”更为根本和有利的历史解释要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易斯·哈克撰文批评特纳：美国道路

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同欧洲的历史一样，在大工业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来临之后，必将迎来阶级冲突与社会革命的升级；“边疆”的概念遮蔽了实际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阶级差别”；“无主土地”也并非培育“美利坚精神”的温床，西部土地的拓殖从根本上只是为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农业基础；“阶级关系”等带有唯物史观倾向的解释工具的运用，更为透彻地揭示了“边疆决定论”中的逻辑抵牾。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本质性思考，拆解了“美国社会安全网”等支撑“边疆假说”的核心论题。

## 二战后的理论新诉求

1945年12月，新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卡尔顿·海斯在题为《美国边疆，什么样的边疆？》的主席演说中大声疾呼：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刻反思特纳的边疆论，其“孤立主义”倾向无益国家当下，损害民族未来。海斯强调，美国的文化之根在欧洲，“如果我们想要在重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事业中成功地担负起领导使命，就必须重视欧美之间的文化渊源关联”。美国历史学家应当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史观，以长时段的视野和文化史的连续性思维重新审视“边疆”——它不应是随西进停止而不复存在于北美大陆的“美国的边疆”，而是横跨了广袤的大西洋，能够代表欧美利益联合体的“西方文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17世纪著名版画家让·迪奥·德·圣让创作于1687年的作品，描绘了一位身着新穎面料裁制而成的衣裾的年轻女子，类似的时尚版画当时在巴黎大街小巷出售。